

全球能源权力战略：概念建构、理论分析及中国机遇^{*}

李 伟^{**}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建构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概念，并通过历史分析提高认知。随着能源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全球能源战略从无到有，从侧重国内到内外兼顾，从侧重利益到侧重安全，从服从旧有能源权力格局到建构自己的联系性结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能源战略目标从增强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发展到把握能源权力以更好地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阶段。取得部分领域支配性权力的同时发挥广泛的抵抗性权力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构建权力—战略、权力—知识结构，主要抓手在于国际能源政治经济关系的建构和综合运用，战略实施的主要区域扩大到全球能源关系毗连国家和地区，战略实施的主要领域扩大到整个政治经济权力技术中可以影响或关联到能源的方面。这样的战略演进反映了深层次的全球权力政治的格局变化，以及国际能源权力关系格局变化带来的双重机遇，迎来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期，值得引起国内学界战略层面的关注。

【关键词】 能源战略 能源实力 能源能力 能源权力

*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政治学）”科研项目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评审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 李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 引言

今天我们有机会谈论能源权力战略，首先得益于中国过往能源战略的持续成功实施、能源实力大幅度增强、能源能力大幅度提升；其次得益于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结构性、体系性变化：权力流散、权力转移、霸权衰弱，甚至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世界经济获得超级权力，呈现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动荡；^①最后得益于以乔纳森·科什纳、苏珊·斯特兰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全球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②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世界能源体系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直接把握运用能源权力关系，致人而不致于人，并更多地把控和影响世界能源发展，是思考能源战略的重点。

重大战略机遇期不容错过。按贝克的理解，这是一场避不开的超级权力斗争，甚至都不必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零和博弈，而是适应未来趋势的正和博弈，我们注定是权力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的见证人，^③甚至“在过去五百年中，世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大多数社会中的社会控制（权力）分布发生了根本变化”。^④正如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学科学术书籍出版繁荣所昭示的那样，以往的旧格局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退去，国家与亚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结成更加复杂的多元关系，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个主要权力结构和交通、贸易、能源、福利四

①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蒋仁祥、胡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②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05年中文版发行，参见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肖宏宇、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Jonathan Kirshner, *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13年中文版发行，参见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李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我们是权力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的见证人。全球化必须当作权力平衡和权力规则的以民族、国际、国家为主导的机制的一种渐进的、后革命时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来解读。在世界经济和国家的关系中，正在进行一场超级权力游戏，一场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民族和国际的国家体系的权力平衡和权力规则都将发生变化和重新定义，特别是经济，因为经济已经冲出领土主权的、由民族国家安排的权力游戏的牢笼，并且与领土主权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相比，已经在数字空间掌握了新的权力战略。超级权力游戏就是围绕权力展开的争论和斗争，同时改变世界经济的民族国家的规则。”

④ 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个次级结构变化纷呈,^① 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呈现多元化、网络化、日常化、流动化、转移与流散等特点,这样的变化在不断地重新界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追求权力和财富的竞争规则并重塑秩序。自1997年乔纳森·科什纳的名著《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以来,可操控的权力结构日益受到重视,经济权术重新得到关注,^② 中国也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制衡美元,争取货币权力,实施经济制裁、个别约谈等权力技术工具和手段。但相比之下,对同样举足轻重、更具操控性和相比货币权力更易实施的能源权力结构及技术,相关讨论却显得沉闷得多,鲜有学者提出明确的能源权力战略、策略、政策和操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能源结构是安全结构的重要部分、是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部分、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重要部分、是交通贸易福利的重要部分,也是现代知识的重要部分和动力。能源权力结构已经不仅仅限于苏珊·斯特兰奇定位的次级权力结构,而是正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权力结构。事实上,伴随着和平崛起过程,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国内外实践也是精彩纷呈。

作为中国国家大战略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能源战略必然服务于并服从于国家大战略,但显而易见的是,好的能源战略能促进和优化国家大战略,而不适当的能源战略则拖累和削弱国家大战略。根据国家大战略的阶段调整,中国的能源战略经历了从单一到系统、从静态到动态、从结构到关系、从专注国内到放眼全球、从边缘到中心、从从属到主导发展的演变过程。当前中国能源战略,已从低碳经济战略,^③ 发展到了本文称为“能源权力战略”的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强国富民之梦,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路径和战略方向在于致力于增强国家硬实力,力求人有我有,人无我有,以实力对比的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获取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同期中国能源战略遵循同样的思路,谋求能源实力的增强,并在此过程中提高能源能力。中国不仅已经具备把全球能

① 苏珊·斯特兰奇把权力划分为四个一级结构和四个次级结构。

② 近年出现了较多讨论地缘经济学和贸易、金融、援助、制裁等经济权术的文献。笔者在图书馆借阅一本Baldwin的英文原版*Economic Statecraft*,不经意中看到居然是高鸿业先生赠书。说明老一辈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个研究领域了。Baldwin严谨地讨论贸易、货币、金融、援助、经济制裁等经济权力技术工具时,并没有中文语境下“权术”一词的褒贬之分,中文“玩弄权术”是贬义词,而本文这里沿着国际文献的路径,探讨“经济权力技术”语境下的“权术”是一个中性词语。

③ 李伟:《低碳经济:国际能源战略新路线》,《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第61—67页。

源战略升级到能源权力战略层次的实力和能力，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剧变之下，还必须加快布局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

二 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和能源权力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对国家实力的量化研究，比较著名的如克莱因的综合国力方程、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综合国力模型等，均以国家实力等价国家权力来对世界体系中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克莱因方程风靡一时，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广泛引用，方程认为综合国力等于以下几项的叠加：基本实体（人口与领土）、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根本利益的体现）、经济能力（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实力观的重要意义是能够在国家所拥有资源的基础上，将国家分成综合的或某个领域大国、超级大国、中等国家和地区强国等类型，以等级制为基础分析国际体系。然而克莱因的理论在解释实力仍然庞大的苏联解体等现象时遇到极大的困难，表现出理论的重大缺陷。事实表明，如果没有运用国家实力的强大综合能力，即便有强大的实力也是不能获得或行使国家权力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或追赶型国家而言，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也能观察到在其能源战略体系中，经历了从追求能源实力到追求能源能力，再到能源权力的过程。

本文认为能源实力（energy strength）狭义的是指当前已经积累起来的能源资源和技术知识；广义的包括更宽泛的国家在其他领域（如金融、贸易、生产）中可转换到能源领域的综合实力，以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从全球范围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获取、生产、供给能源，满足国家生产、消费和发展的需求。

能源能力（energy capability）指运用能源实力的方法技巧和知识，涵盖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组织、治理网络体系，既包括运用和增强实力的意愿、机制、策略和建构能力，以及主导或主动运用、把握、控制战略和节奏（全球发展节奏、能源发展节奏），节制战略对手运用国际政治工具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知识；也包括能源学科建设能力、知识（案例、方法、策略）的累积能力、国际能源议题议程及制度机构的建构能力，以及能源科技、历史、文化、政治、外交话语的掌握。国家能源系统的发展具有正反馈效应，一旦形成良性运行体系，

就会出现能源实力增强,能源能力增强,能源权力增强,再到进一步增强能源实力的正向循环。

能源权力(energy power)是指在能源实力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性地、主导性地、前瞻性地、战略性地、体系性地运用能源能力构建的能源领域中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性结构,在不同情境下可能表现为局面、态势、格局、体系、条约规制和伙伴,是国际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这样的权力也包括因依赖关系的变化从而抵抗、削弱、拒止和节制竞争对手的能源权力。实际上,追求能源权力可以看作一门把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和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技术结合运用的政治艺术。能源权力、能源能力和能源实力可以形成相互间的正反馈并不断相互强化。能源权力的追求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可控的国际治理性的追求,是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技术构建,是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的基于中国话语权的知识—权力域中能源这一子系统的构建。能源权力是一种先发制人权,先发制人的先手权与遏制不同,^①更多的是一种节制性权力。

(一) 实力、能力与关系性权力

“power”在不同的语境下被翻译成力量、权力、实力、能力,比如“world power”译为世界强国、世界权力,“struggle for power”译为权力斗争,约瑟夫·奈的“hard power”和“soft power”一般被译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但亦有译成“硬”权力和“软”权力的,^②奈并没有对它们加以准确区分和定义,也没有将其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般性权力理论。当然“power”在能源领域中也指电力、电能、做功的能力。

虽然“power”作为权力、实力、能力区别微妙,加以区别甚至是自寻烦恼,但为分析逻辑计,本文分别界定了能源实力(energy strength)、能源能力(energy capability)、能源权力(energy power)三个概念,三者的关系需辩证看待。主体自身具备的条件称为实力,在体系中得到普遍承认,有能力运用才能称之为权力。实力是潜在的权力,但不等价于权力,不是所有的实力都能兑换为体系中的

^① Brian Massumi, *Ontopower: War, Powers, and the State of Percep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5.

^②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16页。这里苏珊意指实力不完全等价于权力,实力需要运用能力去转换才能得到权力。

权力，也并不是所有具有实力的主体都一定能得到权力，这还取决于该主体在体系中运用该种实力的本领，也就是能力，而成功取得和运用，甚至可以用“权术”一词来表达这个意义了。苏珊探讨了实力、能力和权力问题，并认为从语义学上来谈论权力是没有意义的，她认为观察、理解和分析全球政治经济变革，需要一种较为宽泛的权力定义。^①“过去拥有权力的业绩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来仍会拥有权力”，还存在着“巨大的资源能力并不一定能够转化成有效的权力”的可能性。苏珊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回避权力的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学认为权力分析不符合经济科学理性，^②而经济理论框架的确难以处理强者可能会利用权力来获得利益规避风险的问题；国际政治领域的霸权迷恋同样也造成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肤浅地对待权力问题，“这种迷恋一度排除了世界体系中与权力的性质和使用有关的所有其他问题”^③“对权力性质的关注就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到了霸权国”，^④这样的范式长期流行的结果，连带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甚至都忽视了权力的双向性特征。

在卢克斯看来，权力通常是“能够被任意运用的双向权力（two-way powers）”，^⑤观察权力的运用能够显示出其占有情况，计算权力的资源能够提供其分配的情况。卢克斯认为权力是一种能力，而不是能力的运用或媒介，并且当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被用于社会生活的时候，它涉及社会行动者的能力。^⑥显然，并非所有的能力都是权力。卢克斯指出运用和媒介两类谬误对权力的影响：运用谬误（exercise fallacy）是指想要成为有权力的人就要赢得胜利，也就是要在冲突的状况下战胜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至于权力到底存在于何处，可能是非常容易令人误解的；媒介谬误（vehicle fallacy）则意味着权力在必然被激活（activate）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发挥其作用，这种观点误导社会学家和军事分析家将权力与诸如财富和地位或者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之类的权力来源等同起来。但是，拥有权力的手段并不等同于就成为有权力的人，美国在越南和战后伊拉克也

①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14—15页。

②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16页。

③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17页。

④ 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第18页。

⑤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观点》，彭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⑥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观点》，第63页。

发现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不等于拥有权力。斯宾诺莎辨析了权力和能力,认为拉丁词完全把握了他认为的能力和权力的差异。在《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在“能力(potentia,局部的、直接的、实际的构造性能力)”与“权力(potestas,去中心化的、间接的、先验的支配性能力)”之间进行了区分,认为能力(potentia)在本质上意味着事物(包括人)“存在和行动的力量”,^①并进一步指出“……不对称的权力概念或者作为权力(potestas)的权力或者‘统治的权力(power over)’是作为能力(potentia)的权力概念的亚概念或版本:它是通过限制另一个人或者他人的选择使他们处于你的权力控制下的能力,从而获得他们的服从”。^②也就是说,权力是能力的一种。

权力在关系调动中得以实施,而且权力不仅存在于支配的一方也存在于抵抗的一方。^③福柯把权力看作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相互诱发和相互回应的关系,认为权力关系、交往关系和客观能力这三者是不同的,反对把权力理解成“能力”,它施加在事物之上,提供改造、使用、消耗或摧毁事物的能力,这种权力诉诸种种直接包含在身体中或由工具作中介的能力。^④福柯把权力关系同通过语言、符号体系或任何其他的象征媒介传递信息的交往关系区别开来。虽然交往始终就是一个国家(人、组织)作用于另一个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某种方式,但种种能指要素的生产和流通之目的或结果却是种种权力效果,这些权力效果并不简单地就是这些能指要素的一个方面。^⑤在他人(组织、国家)身上实施其权力不同于人们施加在物之上的权力,施加在物之上的权力对物做修改、利用、消耗或摧毁,诉诸直接位于身体内或借由工具接力中介的种种能力倾向,或者说诉诸“技术能力”,而施加在人(组织、国家)身上的权力则调动了个体之间或团体之间的种种关系。权力实施亦需要相互应答和诱导的行动。权力一词指“伙伴”之间的种种关系,是一组相互引诱和相互应答的行动。^⑥在关系型社会中,结构内在化、主观化,权力日常化、习惯化;同样在关系型国际社会,复合相

①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观点》,第65—66页。

②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观点》,第67页。

③ Michel Foucault, “Power and Strategies,” in Colin Gordon, ed., Leo Marshall, John Merpham, and Kate Soper, trans.,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pp. 134 - 145.

④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⑤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第230页。

⑥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第231页。

互依赖日益复杂、密切、空间压缩、密度大增，国际战略竞争也日益体现在结构的内在化、主观化，以及权力竞争的日常化和惯例化上。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亦是双向的，支配或抵抗这两方面都会带来关系权力的变化。国际能源体系中并不存在绝对的霸权，全球能源权力处于多方争夺之中，支配和抵抗都可能节制关系伙伴国家、组织或公司的权力。

（二）能源关系与能源权力关系

能源领域的关系研究起初是以能源专家为主导，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为次要层次，最初也更多地接受物质实力为主要特征的能源实力的概念，当然与能源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资源诅咒，即为什么丰富的资源包括能源资源没有带来持久的发展也得到关注。随后的研究和实践发现仅仅重视物质实力（material power）的能源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能源能力，并在运用能源实力、获得能源实力、壮大能源实力的同时，增进其他方面国家实力的这种本领。这样的关注在 1973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成功运用石油武器取得国际政治经济成果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这显然超出了之前传统的国际组织的结构，在国际政治学科甚至引发了对国际机制的研究，^① 使其成为与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并列的三大研究领域之一。中国主动关注和运用这样的全球能源权力关系机制要晚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突飞猛进，纯技术的国内能源关系逐步演变为全球能源权力关系。以石油进出口为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石油净出口国，从 1996 年起成为净进口国，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甚至可能超过 80%；又如以发电装机容量为标准，加入 WTO 后，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突飞猛进；再比如 2008 年以来，能源领域整体呈现出四条交叉的脉络：顶层设计的管理机构变迁、重大改革博弈、技术革命与新兴产业兴起以及新兴能源伦理。^②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的能源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由 1978 年的 5.71 亿吨标准煤

① 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黄仁伟、蔡鹏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7 页。

② 赵紫高：《2008—2017 后零八时代的中国能源断代史——中国能源商业首席担当杂志与它所记录的世界》，《能源》2017 年第 3 期，第 14—15 页。

增长至2017年44.9亿吨标准煤,40年间增长了6.86倍,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①放眼世界,取得如此大幅度的能源发展,大致只有工业革命时期能与之相比,从1820年到1950年,全球能源工业增加6倍,而人口仅增长1倍。^②中国加入WTO之后能源高速发展,电力建设创造了世界奇迹,2001—2008年,每年新增的发电装机容量接近法国全国发电量,每年一个法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波澜壮阔的能源发展。这些变化,都超出传统能源技术领域,形成对全球能源权力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在世界能源体系中,对能源领域的把控,随着国家实力地位从外围到中心的变化,大致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以能源资源占有、能源技术占有、能源生产实力为重点,到以能源关系建构、消费生产贸易平衡能力提高为重点,最后到以能源权力关系建构为重点,能源权力关系往往与能源的资源占有、技术水平、生产实力、消费能力、平衡能力、调控能力等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在世界政治权力变化的大背景下,能源实力、能源能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越发重要,能源实力运用、获得和壮大的本领日益重要,能源权力成为结构性权力的关键因素,以及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源权力上升为主要的结构性权力。

传统国际政治的能力变化往往滞后于实力变化,^③历史上曾经出现国家实力对比早已发生变化,但是霸权权力转换交接滞后的情况,这可能是等待战略机遇,可能是算计战略成本,也可能是真正缺乏把实力兑现为权力的能力,然而最终在体系中会体现强者的意志,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权力关系。在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源权力领域也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罗伯特·基欧汉详细探讨过为什么会发生能源实力转向能源能力再转向能源权力。^④他认为制度碎片化、机制复杂化、领导缺失,形成了权力真空。鲍德温在探讨关系性权力的实现路径时^⑤提到权力概念的关系性是第一原则,对

① 国家统计局数据,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70E&sj=2017>。

② Massimo Livi-Bacci: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An Essay on European Demographic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 转引自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③ 安德鲁·海伍德:《全球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页。

④ Robert O. Keohane, David G. Victor,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s of Energy," *Daedalus*, vol. 142, no. 1, 2013, pp. 97-109.

⑤ Balwin D. A.,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2-23.

分析自成一体的治国之术有启示作用。这些含义可以用“关系概念”和“属性概念”之间的区别来说明。一个国家的人口、领土和财富都是财产，可以不参照其他国家来定义和衡量。同样，政策、决定、影响、企图、意图等治国工具也是一个国家的属性，因为一个人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其他国家的东西来描述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他们所属的国家所拥有和控制。与这些属性相反的是诸如影响力、能力、权力基础和权力资源等术语，这些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关系性的，即它们表示两个或多个参与者之间的实际或潜在关系。能源关系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是权力实施者和被实施者权力关系的生产，这样的生产首先建立在现实生产关系结构性权力的基础之上。中国在能源领域迸发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在消解能源领域传统的权力关系，有条件在扩张生产的同时，阻滞、抵抗、节制战略对手的权力，把握、构建、实施自己的权力，以更好地确保国家战略利益增长。

三 对能源权力和能源战略的再认识

近年来，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权力战略问题逐渐引起部分国内学者的关注。王波提出国际石油体系中石油秩序的演变和权力交替，经历了由英国主导的强制秩序、OPEC 主导的国际秩序、有管理的自由主义石油秩序、美国主导的强制秩序及美国霸权护持下的合作与规则秩序等几个主要阶段，能源权力被争夺并且存在反复和松动，认为“国际石油秩序是否为美国所控制，即美国对石油供应和价格规则的掌控能力，是影响美国国内石油安全政策的主要变量”。^①孙溯源详细刻画了世界石油体系的权力空间、权力世界、权力真空及变革机制，并提出了石油中心—外围—挑战者权力结构模型。^②许勤华认为中国全球能源战略目标的重心从单纯增强能源实力转变到“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③将能源权力分解为油权、市场权、金融权、技术权、资源权和碳权，认为能源

① 王波：《美国石油政策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56 页。

② 孙溯源：《国际石油公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0、123—131 页。该研究认为石油、权力和资本共同构筑了世界石油体系。

③ 许勤华：《中国全球能源战略：从能源实力到能源权力》，《人民论坛》2017 年 3 月（上），第 62—68 页。

权力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通过建设石油天然气管线等能源网络,通过投资,使欧亚大陆的权势和地缘意义重新凸显,而中国也因此将能源实力转化为沿线国家可以接受的能源权力;^①但该能源权力概念仍然是单向的、单一的、强制性、一维的,没有纳入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复合依赖产生的多维的、多边的、双向的关系性权力的外延和内涵,侧重于梳理中国全球能源战略历史、中国能源实力的构成因素、世界能源的转型以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能源公共服务。目前国内能源领域学术界对能源权力战略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反响,专题谈论能源权力的文献仍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中国过去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受到知识界对探讨权力技术(权术)问题的传统的贬抑态度的影响。下文将详细探讨能源权力的话语生成、能源权力如何成为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中国实施全球能源战略的重大意义。

第一,权力本身是一种战略。权力和战略天然联系在一起,权力是战略的目标和保障,战略是权力的抓手和辐射。权力结构化形成的制度一旦建立,同样也会产生出具有政治权力的职位和激励系统,如同贝茨观察到的那样,“制度决定了战略可能性并强制实施各种限制”^②。福柯就如何研究权力的战略特征提供了一些基本思路,即权力并不是一种对某物或某人的“所有权”,而是一个“战略”,是一整套“计谋、策略、技术、运用”,它们被挑选出来,并且按照其功效加以运用。^③这样的权力—战略同构关系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中类似能源权力的范畴。这种对权力的运用能够预先规划,“被计算、被组建、被具体地设想出来”,但它又不需要调动“武器”或“恐惧”,即使它能够“保留一种物质的秩序”。这种涉及身体(个体、组织、国家)的“政治技术学”温和的强制行为是很难被发现的,因为它“几乎没有形成连贯的、系统的话语;它往往由各种零星的片断所组成”,并且聚合了一套形形色色的工具

① 许勤华:《中国全球能源战略:从能源实力到能源权力》,第68页。原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能源投资,使欧亚大陆的权势和地缘意义重新凸显,而中国也因此将能源实力转化为沿线国家可以接受的能源权力,日益成为海陆复合型的世界强国。”

② Robert H. Bates, *Beyond the Miracle of the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 转引自乔尔·S. 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第248页。

③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

和方法。因为这种权力形式来自不同的源头，所以它是一种“形式多样的操作”，并且“无法固定在某种特殊的制度结构或国家机器中”。这种（国际）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来自上层力量（如国家）的宏观权力，而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往往以不可见的、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我们常常认为是限制自己的力量的缝隙中发挥作用。这种社会制度同样也是微观的，因为它并非看上去那样从“外部”发挥作用，而是从我们的“内部”并“通过”我们的身体而发挥作用。^① 全球能源权力关系微观结构中，支配和抵抗都能引发能源关系性权力的变化。显然，在能源领域，日常的普通的抵抗是更好的权力斗争形式。权力斗争采取的战略形式长期被误解了，如果认为斗争的形式就只是冲突，那么显然一切可以缓解或限定冲突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刹车或阻碍。准确地讲，事实上问题在于是否冲突的逻辑可以作为政治斗争可理解的原则和行动的规则。这就触及为什么 19 世纪以来斗争和斗争的策略是如此不断地趋向于被化约到矛盾的贫乏逻辑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今天，如果我们思考国际能源权力竞争的形式、目标和手段，在国际政治中显然可以采取抵抗而又不至于冲突的战略形式。

第二，能源权力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对在现代体系中和平崛起的大国而言，有很大概率会在某一个发展阶段需要采纳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虽然有一个在国际社会中重要性稳定上升的结构性能源权力关系，但由于不存在唯一霸权而且争夺激烈，能源权力关系处于不断的博弈调整中，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范畴。王波注意到能源权力是可以交替掌握，并且不断变化的，^② 国际体系中的石油权力先后由英国、OPEC、七姊妹公司、美国主导。以 OPEC 为例，其 1973 年实施的石油武器可以看作其能源权力的顶峰，随着西方消费国建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能源署（IEA），祭起石油储备方法，其能源权力、权势、影响力和权威就每况愈下，2019 年 OPEC 主要国家沙特阿拉伯甚至把其国有石油公司公开上市，向市场让渡了部分股权。美国众议院最近决定在 2020 年国防预算案中规定对北溪 - 2 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制裁，这打击了俄罗斯的天然气权势扩张。卢克斯认为洛克捕捉到权力代表了一种潜在

① 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庞弘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0 页。

② 王波：《美国石油政策研究》，第 21—25 页。

的可能性,^① 寻求全球能源权力就是寻求能源战略胜利的潜在可能性。国家全球战略的调整就是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原则下, 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对资源进行更加合理的配置。国际战略环境是由国际战略格局的权力结构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的, 国际能源体系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重大变化决定了中国的全球能源战略从增强能源实力走向增强能源能力再到追求能源权力的选择。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 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视为权力的四大来源。能源权力源于经济权力, 同时涉及军事权力、地缘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 穿插了强制、交换和说服的各种权力手段的运用以及权力组织密度的增进。能源本身与权力相联系, 现代能源服务是现代生活的基础, 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能源权力。^② 公平可得的能源全球制度议程仅仅是最近才有动力推动的, 但这个目标在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却被引人瞩目地删掉了。2010 年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2 年为人人可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 201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上, 设置了特别的议程制定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SDG), 并且在 2015 年 9 月被联合国采纳, 议程中提出将可支付的、可靠的、可持续的能源作为优先目标。随着气候变化愈演愈烈, 低碳经济成为能源权力博弈的新焦点, 能源权力又衍生出了碳权的内涵。

第三, 后冷战时期能源权力的参与和争夺更加普遍, 有必要形成以能源权力构建为重点的能源战略, 即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能源权力和货币权力类似, 都是传统国际体系权力松动特别是冷战中后期美苏两极体系瓦解的结果, 都是晚近才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及政策实践, 但在今后一个阶段, 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 货币权力和能源权力都将是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争夺的重要领域和焦点话题, 必然会产生各自独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力理论和权术实践。对货币的主权控制是国家最紧密捍卫的特权之一, 但以主权为代价的敏感性一直阻碍这个领域通过强硬的法律, 也极少有国家争夺美元的货币霸权。^③ 相对于货币权力的单一的运用和集中的领域, 能源权力更具有

① 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观点》,第62—63页。“因此,让我们对洛克的定义进行扩展,假定拥有权力是能够制造或取得变革,或者是能够抵制变革。尽管这种概念非常普通,然而却具有几个特殊的涵义。它意味着权力是一种具有倾向性的观念。它确认了一种能力:权力是一种潜在可能性。”

② Van de Graaf, T.,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9.

③ 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第353页。

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的宽泛性和普适性，具有更多的参与方、更长的时间线、更大的运作空间以及更多地体现可耗竭型资源商品的特性。能源权力可以分解为油权、市场权、金融权、技术权、资源权和碳权，广泛分布在勘探、开采、生产、技术、研究、开发、经济、市场、销售、消费等多个市场环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光能等多个品种，汽车、飞机、火车、轮船、家用电器等多种能源转换器行业，加之每个国家都需要能源，并以不同的形式和位序与能源权力关系相衔接，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能源完全自给自足而不与全球能源权力体系相联系的，在能源权力的争夺中，在支配和抵抗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参与某种形式的能源权力的争夺，在自我均衡严重不足的大国之间、意图控制体系的强国之间，争夺尤其激烈，能源权力的争夺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能源赋予的权力结构包括移动能力权力、替代率权力、武器能源权力等，这些衍生权力结构中的争夺就更加普遍了。

第四，在抵抗过程中产生权力的战略。福柯讨论了一般情况下的权力形成过程，认为在产生权力的地方必然有抵抗，而这种抵抗战略一样会成为抵抗者的权力。国际能源领域是这种抵抗性权力结构的典型领域，能源领域并不存在绝对的支配性权力，反而存在着广泛的因抵抗和竞争而产生的权力关系。一是抵抗和支配之间的联系勾勒出取得支配的一般条件，主导权力被组织成一个或多或少连贯的独特的战略形式；分散的、异质的、局部的权力过程被适应、被加强和被这些全球战略所改变，所有这些都伴随着许多惯性、位移现象和抵抗；因此我们不应假定一个巨大的支配的原始条件，一个二元结构一边是“主宰者”，另一边是“被主宰者”，不是多种权力关系的生产，而是权力关系的多种形式的产物部分容易融入整体策略。二是权力关系确实“有用”，但是一点也不是因为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在战略中使用。三是没有抵抗也就没有权力关系，抵抗更真实有效，因为它们恰恰就是在行使权力关系的这个点上形成的；对权力的抵抗不一定非要从别处来才是真的，不是真的作为一个权力，也不是无情冷酷令人沮丧的始终伴随权力。它更多地存在于权力产生的同一个地方，因此抵抗与权力一样也是多重的，可以融入全球战略。

第五，现阶段中国在抵抗能源供应安全压力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一部分全球能源权力。美国、OPEC、俄罗斯等都可能对中国的能源权力产生压力，从而引

发抵抗,抵抗与权力相伴,能源权力的争夺弥漫在整个关系网络之中,存在于超国家、国家、亚国家各种主体之间。福柯曾讨论到抵抗性权力与战略问题,^①面对权力无处不在的影响和塑造,不论是国家、社会、阶级、集体抑或个体,抵抗权力的一方极少能获得摆脱这种权力控制的自由,为争夺这样的机会以实现自由,抵抗的一方更有必要构建与权力变化相关的战略。按照福柯的观点推论,抵抗和摆脱的战略过程,必然也是自我权力同时构筑的过程,权力和社会同构,权力变了,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亦会同时发生变化,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阶级、集团和个体亦是如此。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对中国而言,权力与战略问题首先是在面对超级大国美国石油—美元秩序这样一种压迫装置,为摆脱战略被动而实施的一种抵抗战略,并且设置自己的抵抗装置。福柯观察到权力关系和其他类型的关系如生产、家庭等交织在一起,这些其他关系往往立马转换成权力关系的条件背景或角色;^②和苏珊观察到的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的结构性权力类似,两位顶尖学者都观察到,唯有能源既是国际争夺的焦点,也是个人生存的基础。

四 能源权力成为新的全球战略选择

(一) 能源文明发展同构催生能源权力战略

最近十多年才兴起的新的能源史研究表明,能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不得不捍卫发展必需的能源权力,尤其是后发国家在面临能源空间逼仄的国际空间压迫时,把握全球能源权力尤为重要。能源体系往往根植于并且决定着一国经济体系的社会文化乃至文明建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均出现了能源消耗增长和 GDP 增长同步。例如罗斯福以降的精英倡导美国梦,大车大房大家的生活,在激励数代美国人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国高耗能的城乡空间布局方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高耗能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美国“沉迷

① Michel Foucault, “Power and Strategies”, in Colin Gordon, ed., Leo Marshall, John Merpham, and Kate Soper, trans.,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pp. 134 – 145.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 and Strategies”, in Colin Gordon, ed., Leo Marshall, John Merpham, and Kate Soper, trans.,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p. 142.

于石油”(addict in oil), 形成难以摆脱的高耗能消费主义社会的模式, 这其实一度也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内部根源之一。

新的能源史观认为能源体系和社会构建同步发展, 天然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史的重要同构部分。如《消费能源: 美国能源的社会史》描绘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国如何通过对能源的文化选择改变生活方式的图景。书中描述了六次美国能源转变, 分别是人力、航船、水能、煤炭、石油、电子能源, 分别对应农业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消费经济时代, 最后还在阐述美国能源危机及环境问题的基础上, 探讨了高能耗社会转变的可能性。^①

能源和文明同构的共识进一步突出了掌控能源权力的重要性,^② 能源权力事关文明存亡。然而,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与物理学家不同, 因为他们对探索什么是不变的不是很感兴趣, 而是寻求对变化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 学者贡献了所谓的“能源文明方程式”, 即从能源消耗的增加中推断出社会成就(文明)的思路。“因为我们使用的煤炭是我们祖先的一百一十倍, 我们相信自己在智力、道德和精神上都比别人强一百一十倍。”这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讥讽地提出的能源文明方程式, 许多其他作家和思想家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构想。激进的创新, 如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机, 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能量机制, 导致了热力学的发展, 牛顿物理学中功和能之间的关系的公式的确立, 以及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建立。同时, 它们也启发学者们将能量定义为贯穿人类历史的驱动力, 并对所有变化负责。

能源史研究表明, 传统的以化石能源大量消耗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可持续。简言之, 消耗过程抵消了上述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念, 同时承担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③ 各国必然独自或集团式地迟早走向低碳发展的路径, 采取低碳经济的战略。^④ 面对未来可能高达 100 美元/吨的碳排放税, 关于

① 刘春燕:《文化·能源·生活方式——评戴维·奈的〈消费能源: 美国能源的社会史〉》,《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 第 83 页。

② David E. Nye: *When the Lights Went Out. A History of Blackouts in America*,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转引自: Möllers N, Zachmann K., *Past and Present Energy Societies: How Energy Connects Politics,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s*, Transcript Verlag, 2012, p. 9。

③ Maximilian Mayer, Mariana Carpes, Ruth Knoblich,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 2: Perspectives, Cases and Methods*,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p. 93。

④ 李伟:《低碳经济: 国际能源战略新路线》, 第 61—67 页。

全球能源权力的争夺会更加激烈,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二) 强国不得不掌握相应的全球能源权力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是现代社会能够顺利运转的血液,所以成为各国争相掌控的焦点。此外,与货币权力根植于国家主权、美元是唯一全球货币不同,能源权力领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绝对的优势和掌控,当前国际社会能源权力争夺是常态。历史上,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资源曾经只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普通的贸易商品,今天却成为寻求世界政治中权力和财富的焦点之一,强国都希望掌握部分全球能源权力。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各国基本都处于一种能源自给自足的状态,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几乎都产自国内,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并没有什么持续的政府间多边能源合作项目。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国内都拥有大量的煤炭,因此几乎没有必要开展国际煤炭贸易。虽然在 1950 年至 1970 年间,欧洲的经济从以煤炭为基础的经济向以进口中东石油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但主要石油消费国都集中在经合组织内部,石油供应非常稳定,因此也没有成立独立能源机构的紧迫需求。在石油方面,OECD 只通过了两项仅适用于本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关于库存和石油分配的立法措施。^①直到 1970 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能自产占其消费总量的 85% 的石油,1973 年还实施强制性石油进口配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为代表,美国国内的州级管理机构开始通过颁布政策限制产量来维持石油价格不下降。整体上这个时期西方国家面临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世界石油市场是买方市场。同时期,国际石油贸易掌握在一小撮有美国或欧洲背景的公司手里,其代表就是业内熟知的“七姊妹”国际石油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 15 年时间里,这种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非常稳定,但情况在 1960 年开始改变。当时在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下成立了 OPEC,这两个国家的初衷是试图效仿美国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的配给政策,通过限产来抬价,但遭到其他创始成员如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反对。OPEC 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卡特尔组织成立的,而是作为一种工具,通过集体行动谈判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而减

^① Colgan J. D., Keohane R. O., Van D. G., “Punctuated Equilibrium in the Energy Regime Complex,”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7, no. 2, 2012, p. 123.

少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依赖。其间，苏联及其盟国处于这一体系之外，在石油方面基本上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石油出口各国已经成功地逐步控制了生产和价格。

OPEC 的兴盛及其所表现出的明显有权力推翻先前对于油价的理解和供应的安排，显然超出了传统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结构研究，OPEC 在 1973 年使用的石油权力，甚至引发国际机制这一分支的学术研究。^① 在 OPEC 攫取能源权力时，西方国家并没有动用国家力量来维护其石油公司的利益，这也许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有意终结旧的列强体系，潜在地也阻止了西方国家直接干预的行为方式。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② 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主要能源消费国之间几乎没有结构性的国际能源合作，只是在核能领域有一个多边机构：1957 年在维也纳成立的 IAEA。IAEA 的建立既是出于对核武器军备竞赛的恐惧，也是出于对核能这一新能源的热情。页岩气革命是能源权力争夺的另一个例子。页岩油已经发现和开采了几十年，为什么会在 2012 年冒出页岩油革命？这可能是因为美国反恐战略导致石油美元关系松动；同时页岩气革命打开一个缓和的窗口，但可能并不会持久。丹尼尔·耶金甚至认为到 2020 年美国可以再增加一个委内瑞拉或科威特的石油产出。页岩气革命直接宣告了俄罗斯领导创立天然气 OPEC 的愿望落空，这显示能源权力的争斗还表现在破坏竞争对手掌控。

此外，对能源制度、机制日益复杂的认识也迫使各国选择能源权力战略。基欧汉等人发现，1950—2010 年，能源制度复杂性发生了四波演进。^③ 他们的经验方法是追踪国际能源制度综合体在战后时期出现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创建新的组织和组织之间的联系、包括新的主要成员即有潜力重塑的成员组织以及重大的内部结构变化例如投票权的单位或重大变化三个方面促进了全球能源权力战略。

气候问题进一步加强了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加剧了全球能源权力的争夺。创

① 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第 508 页。

② Colgan J. D., Keohane R. O., Van D. G., “Punctuated Equilibrium in the Energy Regime Complex,” p. 123.

③ Colgan J. D., Keohane R. O., Van D. G., “Punctuated Equilibrium in the Energy Regime Complex,” p. 122.

设高效的能源政策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在于能源政策需要非常有效的国际协调。以最突出的气候变化为例,控制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或是建立储备以及石油供应更安全均需要国际协作,而这样的国际协作固有地非常困难。在更小的相关国家群体中来协作是一个更具有可行性、更易于管理的解决办法。成功的合作会进一步刺激形成具有可操作实施机制的解决能源气候问题的国家联盟,这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兼顾各成员利益的、具有弹性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往往更容易由去中心化的复杂的协作网络产生,而非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化、条约化的政府间整合的关系体系中产生。

(三) 人类智识进步促进能源权力战略选择

关于能源的智识发生革命,学界逐步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土地、劳动力三大基本要素之外,还应该加上能源要素。在人类对资本、土地、劳动力的开发和知识普及到一定程度之后,维持日常运作刚性消耗的能源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会成为最重要的要素。能源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和决定要素,什么样的能源承载什么样的文明。正是因为能源领域的知识进步,促进了能源权力关系的建构和主要国家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选择。

在知识—权力的意义上,能源的历史被重新重视和深入研究,成为新的主流和前沿领域。这样的进步表现在对能源的历史研究也是逐步从单一的、片面的、辅助性的阐释史,迈向整体的、全面的、主线索阐释的分析史,涌现了一批能源史专著专史以及工具书。^① 人类从智识进步的视角,重新书写能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能源的经济史、技术史、商业史、资源史、地区或国家能源开发史、能源企业史已经有较长时间的研究,但独立的以能源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基本方面和主要线索的能源史却是最近才兴起,如果以斯米尔的开创性文献《世界历史中的能源》^② 为标志,兴起也只有近 20 年的时间。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没有能与之比肩的能源史专著。近代史学先后形成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技术史、环境史等研究分支,晚近出现的西方环境史也有 50 年历史

① 如 Cutler J. Clevelan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of Energy*, Boston: Academic Press, 2009, p. 354.

② Vaclav Smil, *Energy in World Hist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了。^① 能源史长期作为经济史的一部分，也一度作为环境史的一部分来阐释，如麦洛士的《能源大都市：休斯敦湾区的环境史》。^② 由阿斯特丽德·坎德等三位作者合作完成的著作《欧洲五个世纪的能源》于201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基于欧洲经验考察了能源在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中的作用。此外，三人还分别研究了意大利、英格兰、威尔士、瑞典等国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历史，出版了《意大利19世纪至20世纪的能源消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能源消耗（1560—2000）》《瑞典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1800—2000）》。^③ 能源史学关注的重点遵循了从早期的大企业、行业、工业的历史，如早期对标准石油公司等历史研究，^④ 转移到1973年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公司与民族国家关系史，^⑤ 再到21世纪国别及大区域整体能源历史的路径，^⑥ 而且内容也逐渐深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核心。^⑦ 关于现代能源技术、工业、能源企业、地区的能源历史研究比较丰富，能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早就被历史研究者注意到了，如未来资源委员会在石油危机后组织编写了《能源对美国经济的作用1850—1975》，^⑧ 而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也成为能源经济研究的固定内容^⑨。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知识往往同构，并且依赖话语来传递。中国能源战略指向全球能源权力战略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建构。^⑩ 因此，如同布迪厄承认机制和终结的内在性，知识也不能被理解为外部的，作为一种可操作的特定权力，能

① 王凜然：《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刍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30—33页。

② Melosi M. V., *Energy Metropoli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Houston and the Gulf Coast*,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p. 344.

③ 肖艺伟：《评阿斯特丽德·坎德、保罗·瓦尔德、保罗·马拉尼马〈欧洲五个世纪的能源〉》，《全球史评论》2018年第1期，第235—238页。

④ Ida M., Tarbell M., *The History of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The Macmillan Co., 1925.

⑤ Bamberg J. H., *British Petroleum and Global Oil, 1950 - 1975: the Challenge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⑥ Stephen C. Cote, *Oil and Nation: a History of Bolivia's Petroleum Sector*,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00.

⑦ 瓦科拉夫·斯米尔：《能源转型：数据、历史与未来》，高峰、江艾欣、李宏达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⑧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Energy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50 - 1975: an Economic Study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0, p. 774.

⑨ Roy L. Nersesian, *Energy Economics: Markets, History and Policy*,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6, p. 628.

⑩ Sadiya Akram, Guy Emerson and David Marsh, (Re) Conceptualising the Third Face of Power: Insights from Bourdieu and Foucaul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8, no. 3, 2015, p. 349.

源权力从特定的约束中产生,并且能源权力是分散的和生产性的,渗透到国际社会日常事务当中。不论一个国家是否选择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能源权力的运作从来没有被隐藏,而是不知不觉地实践着。它是我们行为的习惯,我们的身份假设和我们所说的语言。监管和实践是内在的彼此之间,而不是通过意识或外部的结构。能源权力关系管道并非不同或对立的信仰,相反,指的是未声明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或常识,它可以作为传递能源权力关系的渠道。^① 人类智识的深入将进一步促进国家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选择。

五 中国的全球能源权力博弈机遇期

从能源实力来看,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多项重大突破,尤其是成为低碳新能源领域全球领先国家;在风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水电、第四代核电等低碳清洁能源领域取得领导地位,在可燃冰、核聚变等超前技术方面也取得可喜进展。中国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可喜的成绩和进步,有效地节制了敌对势力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利用中国高度对外的石油进口依赖等软肋,以能源权力操纵国际能源体系限制、遏制甚至攻击中国的行为。

当前,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发展路径安全,进一步增强掌控和影响世界能源体系的能力,切实把现有的能源实力,转换成世界体系中的能源权力,由我主导,以我为主,这符合当前中国整体战略的需要。本文前面论证了这种能源权力的掌控和能源权力战略实施的可行性,但战略机会、战略窗口期稍纵即逝,必须增强紧迫感,坚定明确地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把过去零散出现在各个重要战略中的能源权力战略显现出来,集中地、系统化地加速推进。针对权力的政治斗争,全球能源权力战略作为一种工具理论,只能一步一步走,如同棋局博弈,先机稍纵即逝,而当前中国走到了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关键时刻。

(一) 全球能源权力格局呈现出结构性变迁临界状态

能源转型竞争以及能源革命进入高潮推动中国加快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1973 年石油危机以后,能源转型开始受到热议,当前气候危机加剧,能

^① Sadiya Akram, Guy Emerson and David Marsh, (Re) Conceptualising the Third Face of Power: Insights from Bourdieu and Foucaul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8, no. 3, 2015, p. 351.

源转型成为必然，人类社会能源史的研究大幅度增加，^①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能源转型上。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重温能源文明方程式，80年代初开始市场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出版物来讨论过去和现在的能源社会。对能源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能源转型的可能性、意义、方法和步骤措施。^②能源史研究发现，最重要的是控制权力、把握节奏，而中国选择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技术准备、产业准备、知识准备均已完成。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廉价易得的能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有关技术带来的热力学效率的提高。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石油价格猛涨，这时能源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才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能源、经济和技术变化之间的长期趋势向好，提高了人们对能源转换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油价的下跌，世界失去了继续大规模发展低碳能源的动力，直到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再次让世界开启了低碳经济的路径。特别是中国成为低碳经济的先进国家甚至是领导国家，以此为契机，中国迎来了构建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窗口期。在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框架下，紧迫的重点任务是要把能源权力战略嵌入主要的对外政策之中，包括总体的战略判断、战略目标、战略机会、战略抓手，理清中国能源权力战略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的关联，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环境突变，世界政治权力发生结构性变动，这种环境变化也反映在权力的分配及其变化上，过去居于权力体系顶端的旧的以政治、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的两极权力结构瓦解，美俄争夺的地缘线从美苏时期的朝鲜、越南、东欧意识形态重合地域，变化到中亚高加索乌克兰等能源重合地域。僵化的权力体制和旧有的结构性权力发生松动，旧的关系性权力出现真空，世界舞台上出现了冷战时期在传统两极格局下居于次要结构的的生产、知识、金融、贸易、能源等权力结构发挥作用的运作空间。部分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权力的

① Möllers N. , Zachmann K. , *Past and Present Energy Societies : How Energy Connects Politics ,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s* , p. 24 ; Vaclav Smil , *Energy Transitions : History , Requirements , Prospects* , Santa Babara : Praeger , 2010 .

② Möllers N. , Zachmann K. , *Past and Present Energy Societies : How Energy Connects Politics ,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s* , pp. 24 , 36 .

变化,比如以苏珊·斯特兰奇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部分学者,其在冷战末期出版的专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就明确提出:与冷战时期安全等顶级政治权力独大的局面相异,当代世界经济中存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并列的一级权力结构,以及运输、贸易、能源、福利这四大并列的次级权力结构。^①当前,与苏珊最初的观察不同,变化最大的是能源权力,其贯穿、影响甚至左右着安全、生产、金融、知识、交通、贸易和福利,并日益上升为一种主要权力结构,而能否建立新的全球能源权力关系、形成新的结构,对于在世界政治经济中谋求权力和财富的斗争至关重要。

(二) 能源领域是 21 世纪国际争夺的焦点和战略制高点

能源领域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争夺的战略焦点,能源权力战略的战术价值可能超过目前的货币权力。中国创造了世界能源发展史上的奇迹,突破国际遏制令西方霸权措手不及。中国之后,在后发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在现行的技术经济结构和碳减排制度下,几乎没有可能实现中国这样的能源革命性的突破。如何处理能源关系亦将成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此外,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发展刚刚稳定在马尔萨斯陷阱上方,并立即就要面对低碳陷阱的挑战。以低碳经济为目标的能源领域的争夺将决定 21 世纪的大国兴衰、现代文明存亡,因此,能源领域是战略制高点,也是国际社会竞争的焦点,比如中美欧日之间已经就光伏等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爆发过数轮贸易制裁和争夺。

中国的能源发展在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强大的张力,环境、气候、国际、政治、社会、文化、消费等方面均感受到了能源快速发展的巨大冲击。以气候变化为例,1997 年全球达成《京都议定书》时,中国由于能源消耗少排放少,不需要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但近些年来能源使用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排放大国并主动迎接挑战,提前转向了低碳发展。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呼吁,各方应不折不扣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强化 2020 年前行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37 页。

动力度，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① 2018年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卡托维兹闭幕，中国重申落实《巴黎协定》的坚定承诺，发出了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积极信号。^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可能需要加征100美元/吨的碳税，能源争夺将白热化，洗牌在即，将出现能源权力的核心行为体和新行为体，出现旧格局洗牌和新格局产生的机遇窗口期。例如俄罗斯对能源权力的运用，巴西、印度、南非追求额外的能源权力，欧洲在能源权力上表现出非标性，中国在能源权力博弈中开始得分。能源将居于争夺的更加中心的位置。所有这些危机都导致人们对石油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从农业到医疗保健、运输到消费品）的重要性有了新的、广泛的认识。^③

为抢夺制高点，有的国家采用了极端的政治经济手段。为掌控更多的传统优质油气资源，为低碳转型争取更大的空间，美国甚至不惜撕下民主自由的道德伪装。以委内瑞拉政变为例，中俄坚决捍卫联合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联手挫败美国和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要求马杜罗总统下台的动议。美国干预委内瑞拉，主要是因为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量是一次典型的披着民主外衣的能源权力争斗。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如果我们能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投资并生产石油，这将在经济上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博尔顿还表示，美国之所以要马杜罗下台，因为这是对该国商业机会的“潜在的重要一步”。特朗普总统本人就有主张为了石油而使该国政权更迭的历史。2012年，在北约干预利比亚一个月前，特朗普对福克斯电视台说：“如果我们能获得石油，就对利比亚有兴趣。如果不能获得石油，那么就没有。”他在谈到伊拉克时也曾发表类似主张。尽管博尔顿等人明确承认了石油是首要利益，但美国和欧洲的媒体一直选择性地忽略这一点。平时敌视特朗普的媒体也都对石油避而不谈，而是采用了干预委内瑞拉是为了民主的说法。^④

① 《王毅呼吁以承诺、行动和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18年12月1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2/01/content_5344973.htm。

② 外交部：《中国为推动卡托维兹会议取得成功作出了关键贡献》，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8-12/17/content_74285714.htm。

③ Buell F., “A Short History of Oil Cultures: Or, the Marriage of Catastrophe and Exuberanc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46, no. 2, 2012, p. 274.

④ 俄媒28日透露称，在上周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干预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承认：这是为了石油。具体参见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9-01/14187412.html>。

(三) 中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呼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全球权力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考察了历史重大变局前后的权力战略变化,认为权力机制的变迁或战略性调整往往是重大历史变革背后的推动因素。以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例,安妮·施沃恩和史蒂芬·夏皮罗注意到福柯曾暗示中产阶级甚至在大革命之前便开始对法国社会加以改变,私有财产的倾向早已经出现;因此,应避免将社会变迁仅归因于重大的日期与事件,并更多涉及一段由更细微、更难以分辨的事件所组成的历史,其原因在于,福柯感到这些纪念碑式的事件遗漏了历史变革的真正开端。至此,福柯的观点在于,历史变迁的发生应归结为“权力机制”的战略性调整,而并非仅仅来源于潜意识或近乎超自然的力量。^①当然,福柯并不把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当作权力关系的对象,权力关系所作用的对象仍然是权力关系,是其他权力关系,个体作为自由身而身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显然,我们不能把福柯理解成传统意义上讨论个人与暴力机器之间关系的政治思想家。^②

在一般方法论意义上,国家亦是个体的。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能源权力的显著变化。俄罗斯通过对能源权力的运用,从苏联解体之后的衰弱状态中强势回归;委内瑞拉运用能源杠杆获得了与其体量不相称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甚至有学者判断,新兴的能源国家,如俄罗斯、中国以及一些中亚地区国家,能否实现国家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源权力的大小,及其对能源权力的应用水平。^③新能源的发现、新式武器的获得、自然灾害、民族冲突的加剧等,都会推动权力发生转移。^④当前中国正处于能源权力的全球性应用与扩张的机遇期,新的能源技术的发展,能源革命与经济社会能源转型,促使中国铸就了生逢其时的强大能源实力,通过适当的战略可望实现全球能源权力。

当前亦是能源权力的全球性争斗中的混乱期、缓和期,低碳能源的大方向已定,如何实现?如何以最优的路径实现?如何在实现的过程中取得国际政治经济

① 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第68页。

②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第33页。

③ 孙霞:《权力与规范 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④ 安德鲁·海伍德:《全球政治学》,第206页。

博弈的优势、更好地获得全球财富与权力？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当前也是中国能源能力的全球性检验和运用的实验期、能源权力的全球性构建与成型的黄金期、能源权力的新兴大国主导新秩序奠基期、能源权力的技术冲撞期之前最后的机遇期。就技术而言，2030 年可能迎来一个重要的冲撞节点。^① 例如，相对于常规采油工艺提取需要消耗能量的 1%，焦油砂提取和升级需要大约 20%—50% 的能量用于提取和制备过程，精炼消耗 10%—15%，还有运输、原油质量下降等因素。一项全球性的历史分析和趋势推断表明，2030 年前后世界石油生产的能源回报可能会小于提取、精炼和运输这些石油的能源需要，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文明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也是绿色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2019 年中国企业在绿色债券市场上发行了超过 300 亿美元的债券。《巴黎协议》后，能源必然转向更加清洁的能源，清洁能源引领的权力机会将进一步筑牢。此外，煤炭将加速退出，^② 但由于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高的情况难以改变，必须进一步把牢握紧国际能源权力。《巴黎协议》的持续实施意味着煤炭将从全球能源平衡中迅速退出，并被非常规和可再生能源替代。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全面实施该协议，可能也无法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大变局之后的低碳发展道路仍然任重道远。能源领域的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国家对全球能源权力的把握影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实施全球能源战略，将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呼应。

（四）中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诸多困难。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处于饥饿线的人口有 8 亿，而目前所有跨越马尔萨斯陷阱摆脱饥荒命运的经济体，基本的社会保障无一例外地都主要依靠现代化化石能源。我们没有足够的传统化石能源来供养全球 75 亿人的现代化生活，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传统化石能源来维系几个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不发起全球能源革命和转向，人类共同的命运可能就是灭亡。然而新的低碳路径尚未完全探明，即使路径可行，但如果能源公平得不

① Maximilian Mayer, Mariana Carpes, Ruth Knoblich,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 2: Perspectives, Cases and Methods*, p. 93.

② Klimenko, V. V., Mikushina, O. V. and Tereshin, A. G., "The 2015 Paris Climate Conferenc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World's Energy History," *Doklady Physics*, vol. 61, 2016, p. 301, <https://doi.org/10.1134/S1028335816060070>.

到解决,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难以长期持续,而中国成功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将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契机。

能够得到基本的现代能源服务是体面的高质量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因此基本的能源消费权力显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全球超过10亿人仍然缺乏电力和其他现代烹饪的燃料,对健康、经济产出、性别不平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能源权力战略能够帮助中国通过和平崛起突破权力边界,^① 传输低碳能源和技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脱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先行实践,是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亮点。能否在更大的范围内破解农业发展问题?中国目前已经规划了庞大的蓝图试图破解这个难题,如构建能源互联网、欧亚能源中心、低碳命运共同体。如何在农业生产领域以及农资生产领域调适能源运用,如何激发民众参与改革发展,非常关键。农业的一次能源使用量较小,在联合组织成员国中,大约占一次能源总量的1.2%,非经合组织国家为3.5%,全球平均比例为2.7%,加上工业一次能源中用于生产农业和化肥的部分,全球农业使用一次能源的份额增加到3.8%。^② 农业能源解决以后,如何增加其他方面的福利,也取决于现代能源的运用。

人类共同社会需要现代能源支撑,而现代高能社会极具能源脆弱性。^③ 即使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其多次大范围断电不是技术故障而是社会建设问题,突如其来的黑暗照亮了高能社会的政治、技术和文化脆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创新的权力技术,包括一般的及某些特殊领域如能源领域特殊的权力技术。^④ 基于主体和他们的偏好是被构造的,理解这个构造是参照社会上流行的“权力技巧”的集合,中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的成功实施必然会形成国际社会中国关于能源环境气候领域的基本规制或规训,在能源领域中率先突破美国霸权治下的西方主体化方法,而实现能源领域全人类共同命运是中国全球能源战略追

① Sadiya Akram, Guy Emerson & David Marsh (2015), (Re) Conceptualising the Third Face of Power: Insights from Bourdieu and Foucault, p. 355.

② L. D. Danny Hadvey:《能源与新的现实1——能源效率和能源需求服务》,索晨霞译,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③ David E. Nye: *When the Lights Went Out. A History of Blackouts in America*, 转引自 Möllers N, Zachmann K., *Past and Present Energy Societies: How Energy Connects Politics,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s*, p. 7。

④ David E. Nye: *When the Lights Went Out. A History of Blackouts in America*, 转引自 Möllers N, Zachmann K., *Past and Present Energy Societies: How Energy Connects Politics, Technologies and Cultures*, p. 355。

求的目标之一。中国的低碳发展模式，全人类能够模仿和效仿，按中国模式人类整体能够在—个地球的限制下实现现代化；而美国的高耗能发展模式，如果全人类都效仿，可能我们要七个地球才够用，因此是不可能效仿，不可能推广的，也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中国若能成功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必将有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图大志，也将促进中国加快实施全球能源权力战略。